

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

漂泊的家庭



苗族

古文厚著

高发元主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



民族家庭实录

D669.1
G452:1

漂泊的家庭

(苗族)



古文凤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 第三集/高发元主编.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9

ISBN 7-81068-336-5

I .2... II .高... III .家庭生活—社会调查—中国
IV .D6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9457 号

责任编辑：蔡红华

封面设计：传智工作室

20 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第三集）

漂泊的家庭（苗族）

古文凤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精工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3 字数：460 千

2001 年 9 月第一版 2001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 - 3000

ISBN 7 - 81068 - 336 - 5/C·39

（本集共七册）总定价：70.00 元

社址：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650091 电话：(0871) 5031071

E - mail: yupress @ sina.com

编委会：

主 编：高发元

副主编：施惟达 邓启耀 卢惠龙 周鸣琦

编 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邓启耀 卢惠龙 肖 芒 周鸣琦

施惟达 高发元 莫贵阳 戴 抗

总序

串起世纪民族文化之链

高发元

大约在110年前，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公开断言：“印第安人部落民族文化生活在美国文明的影响下正在日渐衰颓，他们的技术和语言正在消失，他们的制度也在解体。今天还可能容易搜集的事实，再过几年之后即将无从发现。”为了纠正自己的学术视觉，也为了解决一个代言人的资格，他做了原住民部落的养子，他破译了鲜活的原住民生活之谜，并对那里的文明进行了透彻的阐释。然而，非常不幸，摩尔根的预言在今天的美国已经成为活生生的事实，古印第安文明已成为历史上光辉的绝唱，使美洲大陆的主人印第安人只能在保留地，在白人文化的覆盖下喘息，那些印第安青年人为标明自己的印第安身份，在村寨旁竖一根图腾柱，或在衣服上画一只乌鸦，只有这么一点干巴巴的文化了。他们的语言、宗教、习俗都已灰飞烟灭，辉煌的传统文化成为遗留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梦，一个冷冰冰的梦！并且永远无法破译那一个遥远的梦境。今天人们要理解印第安文化，只能去读一读《古代社会》，万幸摩尔根还给世人留下这么一道暗夜中的星光。

又一个世纪即将结束，新世纪即将降临。全球性的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新的商业文明席卷着每一个角落，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网络的革新，使人感叹地球成了一个村庄，那就是“地球村”。世界正

处在一个从未有过的大冲撞、大调适、大突变和大融合之中，难免有浮躁、阵痛、裂变。在这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时期，如果抓住了机遇，就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否则，就会失去自己，也就可能会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一)

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记下了他采访一位部落首领的经历，那个首领告诉他：“起始之初，上帝赐给每人一只杯子，杯里装着泥土，他们从杯中吸取生命的养分。他们都浸泡在水中，但他们的杯子各不相同。现在，我们的杯子已经破碎，它已消失无踪了。”我们的杯子破了！这可以说又是一个黑色的箴言，他说的是，与生命本身，他的民族的信仰、价值相关的整个结构的坍塌。也许，他们的杯子破了之后，会有其它的杯子替换，但是，所盛的生命之水已经丧失，无法弥补了。今天，有许多专家、学者在呼唤人文精神的复归，也有人在大声疾呼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就在四年前，丽江大地震之后，有纳西族学者断言：“房屋坍塌尚可重建，文化消亡无从复活。纳西东巴文化已出现断层，21世纪很可能再没有东巴。”不注意保护，过度的开发，掠夺式的经营，已使各民族的文化都在出现断层，每天都在流失。仅仅是呼吁、呐喊，已经无济于事，只在书斋里研究，没有办法留住正在失去的文化。多年前我们就在尝试一种做法，我们主张走出书斋，关注世纪之交纷繁复杂的社会人文事实，到带着泥土味的民间田野去。真实的知情者就是生活者，从生活者那里采撷留下沾满了尘埃、染满了烟草味的第一手资料，主张脚到、手到、心到，用生动、真实、传神的文字及图片，留下我们的所见所闻，包括正在发生着的变迁。因为我们无意于做某个民族的救世主，我们也不可能把所有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淋漓尽致地写透，我们只能选择一扇极小的窗口来透视，至少把我们的见闻留给后人，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几年前，我们撰写出版了中英文两个版本的《云南民族女性文化丛书》，获得成功，书中描述的是云南26个民族女性角色，也是由男女两性为基本要素构成的家庭的一半。今天，我们又从中国56个民族中，各选择一个家庭为对象，撰写约300万字的《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这是过去工作的继续和发展。我们相信，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或对一段历史的评说，会带有时代的印迹和个性倾向，但对一个家庭的真实记录却可以作为永恒的参照。这套书不是家庭史、不是家庭回忆录，是以记者的敏锐捕捉沉落的素材和细节、以学者的功底去观察分析、以作家的手笔去抒写，将深奥的、理性的学术观点，隐藏在随意的寻常道白之中，让读者在欣赏故事中明白人类学的知识、生活的内涵及

社会的发展变迁。

(二)

实际上,中国的少数民族,除了很少一部分有文字记录着自己的历史文化外,绝大多数民族并没有自己的文字,许多历史文化是通过口头传承而进行,这也可以说是该民族的一种口头实录。他们的传统文化骨血、文化根脉,是通过一代代人传递接力棒一样传记下来的。无论对历史、宗教还是自然万物,无论对道德、伦理还是思想体系,都是通过记忆来完成的。歌声、故事、传说是他们记录历史、传播知识、表达思想、交流情感的工具。这些歌谣、故事,也只能属于这样一些大自然的子民——他们在广袤的大地、浩瀚的海洋、茫茫的雪域、苍凉的沙漠、雄峻的高原、深邃的峡谷、平静的草原之中,从那里诞生了凝结着浓浓生活情、深深历史恋的歌,诞生出生存方式和对世界的理解,那些歌不是唱出来的,是流出来的。

就以“我们从哪里来?”这样一个关注人类自身命运的问题而论,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答案。有许多民族,诸如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等民族都有一部部自己的迁徙史诗。在那一条条跋山涉水的遥遥路途中,留下了血和泪,留下了子孙,留下了爱情,也留下了关于生与死的歌唱。每到月明星疏时,那些飘逸而高远的天籁之音牵动着人们的心魂,在历史弯弯曲曲的河道上徘徊、辗转,使人们觉得星球和宇宙也同样在长途跋涉。

众所周知,许多民族是以“听觉文化”作为文化特征的,而不是视觉文化。他们无不以口述的神话、传说、故事,同步入发达社会的大众传媒为交流工具的现代文化相区别。那些为整个民族所共有的创世神话、部族起源、英雄史诗,包括童话故事,都是这个民族对世间万物(包括自己)的理解、解释,可以说是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一种集体意识的“隐形文本”,有人说那是一笔“无形的文化资产”。譬如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玛纳斯》、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崇搬图》、景颇族的《司岗里》等等,几天几夜的说唱吟咏中,贯穿着一种不可遏制的生命意识,一种颤栗心魂的诉说欲望,一种难以表达的交流渴望,那里面不仅仅是直白,还有诗、有歌、有吟诵、有感叹,里面灌注着大地的年轮,是生命的启悟,是道说不尽仍要说的“天问”。我们将这些丰厚的文化底蕴,珍贵的史实,在《家庭实录》文本中得到体现。既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那我们就从细胞着手,来窥视每个民族,窥视整个社会,有的甚至还能串起整个民族历史的构架。以实录一个家庭生活,提供一个管窥民族内心的窗口。相信再

过十年、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同一个作者再写同一个家庭，那时，感慨的可能不仅仅是作者了。我们能否把遗落在岁月流沙中的珠贝一粒粒捡起，用家庭生活这根丝线穿好，结成一串，那么，历史、或者说正在发生的历史、以往的岁月、变迁中的心迹、文化的消失或另一种文化的诞生，不都在里面了吗？我们正在努力这样做！

(三)

有一位印第安作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为《寻回被盗去的声音》，文中说：“我不认为只有印第安人能写印第安人。但是你们不能偷走我的好事然后把它说成是你们自己的。你们不能偷走我们的精神然后把它说成是你们的，这是北美洲的历史！被盗走的财富、被盗走的生命、被盗走的梦想、被盗走的灵性。如果你们的历史是文化统治的历史，你们必须认识清楚并且对这段历史讲真话。”这位作家所谈的关键是一个阐述权的问题。就以美国为例，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形成固定模式的“西部故事”，在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到大量对印第安生活素材的盗用，对他们习俗的恣意扭曲。这些作品中所透露的都是殖民者的历史叙述，是完全以白种人的文化视觉去衡量的，所以，得出的结论不会是公允的、客观的、真实的，这就涉及到一个视点及文化心态的问题。我们知道，人类学是通过著述文化来促使不同文化或学术间相互理解为基本出发点的，由于独特的田野工作性质，其真实性应该是它的生命，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应该是“生物人”或者“数字人”，不是标本和数字化的存在，而应该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社会人，这要求作者要站在当地人的立场叙述当地人的生活，而不是照搬一种模式，或是“先入为主的框架”。所以，在这套丛书中，有不少是本民族的作者写本民族的家庭，甚至还有一些作者直接就写自己的家庭，写得很精彩，写得更贴近生活的本真，从心理、文化、情感和细节的掌握上，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作者的文化背景及思考贯穿于字里行间，我们从中看到的是隐藏在文字背后的许多文化积淀。这就避免了以往人类学作业中出现的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触而不觉的弊端。这些作品中，作者的叙述是真实而客观的，文字是朴实而有感觉的，材料是第一手而原汁原味的。我们说过，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是对一种人类学文本的实验。我们相信，只要是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只要我们真实地记录了、思索了，就不会被岁月的流程所淹没，至少会留下各民族家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轨迹。

目 录

一、	山寨协奏曲	1
二、	漂泊的家庭	11
三、	外公与外婆	21
四、	母亲的纺织	30
五、	雨鞋的诱惑	46
六、	父亲的神话	52
七、	荒芜了的猎神位	56
八、	祖传医术	61
九、	回荡在山乡的旋律	69
十、	回归东方	79
十一、	我的兄弟姐妹们	84

一、山寨协奏曲

我是一位苗族的知识女性。20世纪初，一群自称“蒙”的苗族拓荒来到云南省西北丽江县、永胜县等地。我就是永胜苗族“夸故”氏族的女儿。我的故乡名叫大水箐，是个有二十几户苗族的小山寨。

千百年来，我是第一个走出这个小山寨的人。我清楚地记得，15年前，当我离开故乡时，父亲拿出尘封了二十多年的芦笙在火塘边吹了一夜。他边吹边哭，说：“北京，我们只在传说中听到过，那是从前‘画呆’（苗族人对皇帝的称呼）住的地方，相传我们苗族人的老祖宗‘自尤’住在‘干勒浪’（意为黄河下游）。过去苗族人只知东迁西逃，不知读书识字，世代没有谁到过北京见‘画呆’，也没有谁知道‘干勒浪’在哪里。如今我的女儿好能干，要去

北京,这是我们祖祖辈辈不敢企及的。”当父亲在火塘边吹奏着悠扬的笙曲时,母亲则坐在她的织布机上“当、当、当”地为我赶织麻布。父亲“咪喇哆来来咪嗦来,咪嗦咪来嗦——咪来哆喇嗦——”的笙曲,和着母亲“当、当、当”的织布声,形成一支和谐而古老的协奏曲,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当北去的火车拖着长长的汽笛声飞驰于云贵高原,我仿佛看到了我的先祖们扶老携幼,在那岩石裸露的大山里艰难跋涉,看到了群山里一串串民族拓荒者的足迹。十几年来,我虽然生活在城市里,享受着现代大都市一日胜过一日的繁华和富有,但偏僻小山寨父母亲的协奏曲时常在我的耳边回响,我的心没有一天离开过小山寨,我的梦总是从那里开始。15年后的今天,当我再次回到这个我日思夜想的小山寨时,我的父母已双双作了古。

我的故乡——大水箐



那是金沙江东岸高高山脊上的一个小山寨。经过两天的旅途奔波,我终于又回到了金沙江边。从这里到家

还有四五个小时的山路。虽然好几年前车路通到了一个叫梓里的地方,但除非梓里街天,离这里十多公里的坝区人开车来赶街,平时几乎没有什么车上山。一位在江边卖芭蕉的大嫂认出了我,她说今天是梓里街,但现在只有返回的车,没有上山的车了。我得从这里走着回去。

金沙江河谷闷热无比,江岸的大山高耸入云,道路陡峭崎岖。我背着行囊,有时几乎是手脚并用地爬行,朝着东南方向走去,走了大约3个小时才到达梓里。梓里是家乡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山区小集镇,这里居住着汉族、白族、纳西族等民族,我的小学、初中都是在这里读的。这里有一条古老的小街。每逢街天,山里各族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此进行小商品交易。母亲说,她很小的时候就常跟随外婆背东西到这里卖。我到这里时,集市已散,山路上到处是离去的人群。

刚进入街北口,一眼就看见了二哥,他把我迎进街边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屋,说那是侄子租下来开门诊的。果然,屋内侄子正给一位病人打着吊针。侄儿侄女们都在里面。在门诊室休息了一会儿,得知大哥在街的南边摆地摊卖药,我于是拉着侄女的手,挤出拥挤的人群去寻大哥。我看见高高的石坎下,供销社门口,大哥正在低头包着一包草药,他的面前蹲着几位求医者。见我到来,大哥一下站了起来。他1.75米高的个子,却瘦得好似风一吹就会倒。我问大哥为什么不去和他的儿子一起在租下的屋子里开门诊。大哥说,他要让儿子去开辟属于他自己的天地。

我的到来使全家人都很高兴。二哥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去买米;大哥扛回了一个整猪头;侄女本是来卖鸡蛋

的，见我到来，她说：“姑姑回来，这鸡蛋我不卖了。”然后我们一大家人一起回了家。

我有两个哥，两个姐，一个妹。大姐嫁给离这儿不远的苗族人家；小妹嫁给了乡政府所在地的藏族小伙，离这里大约有3个小时的路程；二姐嫁到很远的地方，前年得病死了。大哥1941年出生，长我整22岁，只有小学五年级的文化。那是20世纪50年代末，大哥结了婚还去上学，同学们笑他背着娃娃读书，他就此退了学。后来政府把他送到永胜、丽江去学医，学成后在当时的大队当了十多年的赤脚医生。那时候大队除了负责大哥每月30斤的口粮外，没有任何报酬。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鼓舞下，大哥任劳任怨，半夜三更只要有人喊，他背上药箱就出门。有时为抢救一位病人或难产妇，他要赶一夜路。大哥的身体因此被拖垮了，但不知多少病人被他从死神手里救了回来，所以方圆百里之内没有不知道古医生的。70年代末，大队医疗站垮台，大哥失去了他心爱的职业，只能回家来边种地边给那些找上门来的病人免费看病，同时也跟随父亲学习我家的祖传接骨秘方。80年代中，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我力劝大哥开私人门诊，草医西医并行。记得当时大哥对我说：“都是亲戚朋友，我怎好意思伸手要别人的钱？”因此门诊一直没有开，大哥总是扛着猎枪上山打猎，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人熬瘦了许多，而野兽又打不到。直到1991年，不知什么的促动，大哥才每五天一次到街上摆摊行医。大侄子初中毕业后就随大哥学医，后来政府把他定为大哥的接班人，专门送到乡上培训。如今每逢街天，他们父子双双在街上摆摊行医。大哥生有三男三女，大侄女大我两岁，二侄女小

我一岁，大侄儿子又比我的妹妹小一岁。如今除了小侄子外，侄儿侄女们都已成了家，我呢，早就是当了姑婆、姑奶奶的人了。

早在20多年前，大哥就分家出去另立了门户。那时候除了二姐以外，包括大姐在内，我们都未成家。父母带着我们生活。后来大哥哭着说，两位老人应有一人同他一道生活，遂把父亲要了去。这样，两个儿子各赡养一位老人。按照我们苗族人的习惯，大哥、二哥还要承担我们四姐妹的出嫁问题，即举办婚宴、负责我们的嫁妆等。二姐算是大哥嫁出去的，现在剩下我们三姐妹留给二哥，似乎二哥负担太重。当时我曾听父母亲说过要我去和大哥住，但想到大哥一家孩子多、负担重，也就没有再谈这事。

二哥以前是梓里学校的优秀生。那时候读书花不了多少钱，老辈们没有读过书，有条件去读书，成了我们苗家最光荣的事，所以父母把我们这些娃娃全部送进了学校。二哥读初中，大侄女读三年级，我和二侄女读一年级。二哥的午饭都放在我的书包里，可是他总也不来取食。我放学时，他往往还在上课。我担心二哥肚子饿，便跑到他教室的窗外用苗话大声地喊，直到他跑到窗前对着我摆摆手，摇摇头，我只好又把午饭背着回家。二哥高中毕业是1975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年，上大学名为贫下中农保送，实为凭关系、靠“资格”。我们家世代代是老实本分的山里农民，父母亲没有能给二哥找到一条出路。二哥回乡当了几年民办教师，然后务农至今。在我们这偏僻的大山里，人们见识少，学校所学的东西回乡用不上，学生没有一技之长。读书使得二哥多了几分文雅却少了一些闯劲。如今二哥天天“脸朝黄土背朝天”地苦，他这个高中毕

业生的家境与村里没有读过书的人差不多。

二哥长我7岁,小时候他经常带我去抓小鸟,点着火把冒着大雨到山沟里捉石蛙。我常蹲在他身边,看着他把一根竹管烙上七个孔,做成笛子或箫,吹出“宝宝哎宝宝,弱小的宝宝,爱哭的宝宝”等动听的苗歌。他吹笛子常把村里的老奶奶们给吹哭了。我也常看着他把牛蛙的皮晒干后,蒙在一个竹筒的一端,用马尾当弦,涂上松香,制成二胡。每当夜幕降临,他就坐在屋檐下,拉出《二泉映月》、《翻身道情》等悠扬的二胡曲。二哥酷爱音乐,多才多艺,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他应该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大学生。我上高中、大学全靠二哥提供费用。他经常赶着马把包谷驮到坝子换成大米,再送到学校食堂;他穿着草鞋去教书,也总是把民办教师每月那15元补贴寄给我当学费。二哥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我的兄弟姐妹



从梓里到家有近两个小时的山路，我从7岁上小学开始，不论天晴下雨，天天在这条路上跑，早出晚归，经常还打着赤脚，整整跑了8年。如今偶尔回来走一次，总觉得这路太远太陡。我们回到家时，太阳只有丈余高了。

二哥家的房子坐北朝南，正房与对面的厩楼、右侧的灶房围成一个四合院。一进大门就看见嫂子和侄女在廊檐坎上推磨。我问：“磨什么好东西？”侄女回答：“磨豆腐，迎接姑姑嘛。”原来小侄女也去赶街了，在街上听到我返乡的消息后，率先跑回来报信了。二哥的四个小孩中就只有这一个姑娘，读书读到三年级，回来跟哥嫂说，打死她也不想再去读书了。因家中无人手，哥嫂也就随了她。在我们苗族人家，儿子被认为要接掌门户、延续香火，要“端格朗”，即人死和祭祖时，只有儿子才可以给死者和祖宗祭献食物，只有儿子祭献的东西，死者和祖宗才能享受得到。女儿再孝顺，她祭献的东西，死者和祖宗也是享受不到的。因此，男孩出生后，胎盘都要埋在堂屋里的顶梁柱脚下，象征儿子是顶梁柱，要“端格朗”；而姑娘出生后，胎盘则只须埋于门背后或母亲的床底下。但是没有姑娘也不行，像小侄女这样，从她能做点事起，就开始在嫂子的指挥棒下转，找猪菜、推磨、做饭、放牲口、喂猪等。生女孩是福气，父母亲都要少苦少累些。

以前每次回家来，母亲总是拄着拐杖，含着泪站在屋后迎接我。如今母亲却永远从这个家里消失了。我心里那份失落、那份不自在，那种进出不是、坐立不安的感觉，实难用言语形容。大哥看出了我的不安，他在二哥家火塘边煨完一罐茶后起身说：“算了吧，这第一个晚上还是到我那边去睡。”